

中日“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 学术研讨会论文

[编者按] 1993年9月7日至8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日“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是:方连庆教授、黄宗良教授、陈峰君教授、林代昭教授、王杰教授、张锡镇副教授。成蹊大学出席会议的是:加藤节教授、广部和也教授、宇野重昭教授、关口末夫教授、田中治男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会见了与会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教授、成蹊大学法学部长广部和也教授、成蹊大学代表团团长加藤节教授分别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有四位学者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与会代表对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次学术研讨会对进一步加强两校的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将提交会议的论文按发言顺序刊登于后。

俄罗斯政局与俄国同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黄宗良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一直成为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1991年“8·19”事变和紧接着苏联的解体、1993年十月事变更是牵动着世界上亿万人的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俄罗斯政局的重大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其对外政策、影响着国际形势、国际格局,从而使许多国家需要相应调整、修改各自的有关对外政策。

对苏联、俄罗斯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影响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有几种主要因素: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大国地位,政权的性质,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前两种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后两种因素是变动性较大的因素。

俄罗斯今年十月事变之后,可能出现局

势相对稳定时期,但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谁将主宰未来俄罗斯的命运,现在尚难作最后结论。

因此,我们在研究东北亚格局中,不能不冷静观察俄罗斯政局的发展趋势。

一、苏联的解体与东北亚格局的变化

苏联的解体对国际格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对东北亚地区的格局也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对欧洲局势产生的影响的差别,不仅在于强弱程度不同,还在于——从短期内看,走向也不同。它表现在使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进一步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彼此封闭走向

相互开放、加强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苏联衰落、解体之后，战后持续 40 余年的东西方对峙和美苏争霸的格局彻底瓦解，多极格局开始出现。对于东北亚地区除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一个从军事上、政治上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从身边消失了。苏联解体前后大幅度的裁军和从亚洲几处同时撤军，苏联、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纷争、经济的混乱、危机、寻求合作和援助以恢复经济、摆脱危机的渴望，为这个地区的缓和、稳定、合作、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好时机。另一方面，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尽管其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难以与前苏联相比，而且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国内的政治、经济变革和发展经济上，但由于它掌握着前苏联绝大部分的核武器和战略力量，由于它存在着不容低估的科技力量、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仍然不失为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它的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还不等于使这个地区出现巨大的军事和政治真空，从而也不会使这个地区为争夺和填补这个真空而出现剧烈的动荡和失控，象东欧和高加索那样。这也是这个地区形势的缓和、格局趋于稳定的因素。

与苏联的解体相应的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实力地位的下降趋势。因为，实际上——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俄罗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不可能重新成为其强大的对手，以防止苏联扩张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已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意义。美国必须对原来的战略和对东北亚地区国家的政策作相应的调整。东北亚地区一些国家依靠和利用美国以对抗和牵制苏联（俄罗斯）的需要程度也减弱了。造成美国在这个地区地位下降自然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如美国自身的衰落、日本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等等。

苏联的解体及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严重削弱，使日本解除了直接的巨大的威

胁；加上日本近年来国力的迅速增长，使它在东北亚地区，乃至于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日俄关系相对于俄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矛盾更为突出一些，解决起来更难一些，时间可能更长一些。这指的主要是领土问题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但日俄关系不会恢复到日苏关系曾经存在的全面紧张和对抗，总的趋势是缓和、松动和不断扯皮。我们必须从日俄关系看到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双方互有所求。俄罗斯对于日本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的需求有利于领土问题的逐步解决，从而也有利于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不断改善和缓和。日美关系矛盾在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日本理所当然地不甘处于屈从美国的地位；它要同美国平起平坐，必然要反对美国企图建立一极世界，成为其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经济上的摩擦、互为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争取主导权的斗争等。但美国是日本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国；日本要为政治大国，更多地参加国际事务，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安全问题在一段时期中仍需对美国有所依赖；因而日美关系短期内不会失控而影响东北亚地区新的不稳定。日本既要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又要避免严重对抗，利用日美关系走向政治大国。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领导人强调“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同等重要”，日本报界认为必须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为轴心的双边关系，中国则把对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基本国策，都说明双方互有需要。这种需要远远超过双方之间不可避免的某些分歧。历史经验说明，中日两国和平合作则两利，对抗冲突必两伤。苏联解体之后，个别人提出“中国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

在东北亚地区，苏联的解体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影响最大、最直接。二战以后，朝鲜半岛一直是两极冷战在亚洲的焦点。进入

90年代以后,这里的紧张局势已大大缓和。1990年9月和1992年8月,韩俄、韩中关系的正常化,标志着“东亚冷战结构已经崩溃”(《纽约时报》1992年9月18日)。韩国与中、俄关系改善必然影响到韩日、韩美的关系,推动了朝鲜半岛南北的和平统一事业。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同年12月,北南双方也签署了《朝鲜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这标志着朝鲜北南关系开始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提高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挑战和机遇。首先它解除了长期以来中国北方的一个强大威胁,为中国的和平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契机。其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从反面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增强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凝聚力和紧迫感。近几年来中国的发展说明这一点。

苏联的解体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的缓和、稳定、合作、发展。除上述各国的变化之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也已出现了好的形势,特别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主持下,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的起步,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这是苏联解体后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化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的一项积极成果。

二、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斗争与对外政策的调整及其同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社会处于向着另

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俄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确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确立什么样的外交战略等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俄罗斯社会存在着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它们有各自的主张,并且为实现各自的主张而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开始阶段又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包括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的派别有足够的力量使社会普遍接受自己的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另外,掌权派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修订自己的方针政策。

1991年“8·19”以后,经过不断的分化改组,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左翼政治力量以共产主义政党为代表。在议会中共产党的代表同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结成集团。中间政治势力是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原“民主派”分化出来的。其首领是曾握着相当权力的议长哈斯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这一派是以厂长、经理阶层为支柱的曾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政治势力。右翼政治势力是总统和政府的主要支柱,是主张并急进地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急进地实行私有化政策的急进的变革派。在“8·19”以后的近两年中,以总统和政府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和以议长和副总统为代表的中间派政治势力,以议会为主要舞台,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就经济变革的方针、方式,和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问题展开激烈的、逐步升级的斗争。至今年10月,叶利钦才以武力使这场斗争告一段落。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在内政问题主张不一,在外交政策也存在一定分歧。俄到底实行“大西洋主义”或“欧亚主义”或二者的有机结合,一直是俄国内争论的问题。叶派在外交上着眼寻求西方援助推进国内的改革,认为“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手里,而在华盛顿、波

恩、伦敦、东京手里”^①，“俄要为自己的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要吸引大规模贷款和投资”，“面向西方是唯一理智的选择”^②。反对派则在外交上主张突出俄罗斯利益，不赞成倒向西方，指责叶太亲近西方，“外交软弱”，是“卖国外交”，认为“西方并不希望俄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俄有效地成为新的军事大国”也“不符合美国和北约的利益”。议会甚至要求实行“亲西方外交”的外长科济列夫辞职。可见双方在对外政策问题的分歧也是很明显的。俄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这方面的分歧。1992年6月5日，外长科济列夫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俄国有一个军工集团，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同观点的”，“军人难以适应”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对那些三十年来习惯于认为美国、西方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对手的那些人来说，很难承认黑的已变成白的了”。

1992年7月底，即在原定的叶利钦访日前一个半月，俄议会和政府围绕着俄日领土问题发生的一场争论是两派在对外政策问题矛盾尖锐化的一个突出事例。7月28日，俄议会秘密举行“俄日关系和俄联邦领土问题听证会”，把争论推向高潮。在听证会上，各派的立场明显不同。外交部坚持按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的条款处理领土问题：在签订和约后，把齿舞和色丹两岛先归还日本，然后再谈判两岛问题。外交部亚太二局局长叶菲莫夫认为，当时苏联接受这些岛屿是斯大林帝国政策的行为，是不公正的。而俄军方则持战后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不符合俄国的战略利益，是不能允许的。议会宪法委员会责任书记、人民代表鲁缅采夫认为“南千岛群岛”是俄主要的民族利益所在。它在军事战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把这些岛屿交出去将会大大削弱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它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得到日本的援助。他指出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必将降低俄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他

提出一种妥协方案是，国后和择捉两岛归属俄罗斯，齿舞和色丹两岛由日俄共管，主权属两国所有。由于分歧尖锐，叶利钦第二次推迟了访日。

由于国内反对派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对和干预，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经济援助“虚多实少”，并且附加了许多的政治条件，不把俄国当成“平等的伙伴”，总统和政府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调整“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今年4月，叶利钦发布命令，批准了由政府外交、国防等部与国家安全会议同俄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委员会及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联合讨论和制定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了俄联邦的对外方针路线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

《基本原则》确定的俄对外战略目标是作为国内改革服务，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提出：“俄联邦尽管面临危机，但不管从其潜力来看，还是从其对世界事务进程的影响、或从与此有关的责任来看，在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它仍然是一个大国”，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负有责任”^③。《基本原则》规定了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维护俄国利益，实行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外交，在继续向西方倾斜的同时，“奉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关系，仍处于“优先地位”，不仅要与之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要实现“协作和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重视同亚洲国家首先是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发展平衡和稳定的关系”，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基本原则》发表后，俄国有的国际问题专家评论说，它只是一批人的看法，这种看法在领导层进行选举，或出现其它变化后可能发生彻底变化，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④从俄外交政策的变动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来说，这个评论有些道理；但从俄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一年来的外交活动来看，《基本

原则》所确定的俄国外交战略方针在一段时期中恐怕不会轻易改变。

叶利钦和科济列夫多次讲，“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一头朝向西方，一头朝向东方”。上述外交政策的调整反映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上，就是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大力开展“东方外交”。1992年11月、12月，1993年10月，叶利钦先后访问东北亚韩、中、日（日本从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属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地理位置则属于东方国家）。反映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外交的新态势。

1992年11月18日，叶利钦对韩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叶利钦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亚洲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叶说其访韩的目的是“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不是象过去那样同一个次要国家的关系”。叶访问期间，签署了《大韩民国和俄罗斯关系原则条约》。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发展1993年两国国防部间的联系的措施相互谅解备忘录，规定了两国军事主管部门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叶利钦保证俄政府将支持防止在朝鲜半岛扩散核武器的措施，决定停止对北朝鲜提供的军事援助。韩国同意重新向俄提供曾中止的3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俄国提出建立合资企业、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资源，以及在军转民领域和利用俄科技潜力等方面23个合作项目。

苏联解体之后，中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停顿和倒退，而且有了良好的发展。中俄东段边界协定已经生效，原驻蒙苏军已全部撤退，两国经贸十分活跃，1992年中俄贸易额达到58亿美元。1992年12月17—19日，叶利钦总统访华。这次访问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成果显著。叶利钦说，发展俄中关系在俄对外关系中居“优先地位”。在叶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不仅保留了原中苏联合公报中的积极成分，而且

有了重要的发展。声明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声明指出“双方将努力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促进有助于加强东北亚地区相互理解和经济发展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计划的实施”。两国还签署了包括经贸、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合作的24个文件。叶利钦访华不仅对于中俄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东北亚地区的进一步稳定、和平、合作和发展均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叶利钦认为，此次访华“为两国迈向21世纪创造良好条件，并开辟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世纪”^⑤。科济列夫评价说，访华“实现了俄中关系的突破，加强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的地位”^⑥。现在，中俄关系已处于正常和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上，比较起来，日俄关系发展较为缓慢，领土问题的解决较为麻烦。今年10月11日，叶利钦总统在莫斯科十月事变刚刚过去一周时对日本进行访问。尽管叶利钦此次访日可能包含着国内政治斗争的考虑，尽管日本新闻界对这次访日评价并不高，尽管这次访日成果还不显著，叶利钦按原定日期而没有出现第三次推迟访日这件事本身，不能说是坏事。叶此次访日，签署了日俄关系的《东京宣言》和日俄《经济宣言》。前者提出，在就四岛归属问题的谈判中，双方一致同意应依据历史事实和法律，以凡两国同意而制定的各种文件以及法律与正义的原则为基础解决这个问题。叶利钦在同细川首相会谈中说，同日本关系对俄来说处于优先的位置。叶表示，“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真正的继承国将信守苏联签署的所有条约，担负起前苏联所负的责任和义务”。讲到这里，叶对身旁的翻译叮嘱，“要翻译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点”。细川首相表示，日本承诺的援俄金额为46亿美元，仅次于美、德，

“我们将尽快将这些援助付诸实施”。叶利钦后来在回答记者关于从北方领土撤军的问题时说,我们已削减了在北方四岛上的驻军,打算撤出所有的军队,只保留边防警备队。由此看来,叶访日虽未使日俄关系有重大进展,也仍有积极意义。

三、十月事变后的俄罗斯政局及其同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势

这一部分我们将重点研究前者。前已述及俄政局直接影响着俄罗斯同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十月事变之后,俄的政局将会怎么发展呢?

俄罗斯目前还处于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时期之中。俄罗斯将是谁家的天下?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作最后的结论,我们只能就其政局发展趋势作一粗略的预测。

总的说,十月事变结束了一年多来俄国双重政权的局面,又一次稳住了叶利钦的权力地位。由于俄国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新的强大的有组织的激烈反对派,俄国可能出现相对稳定的政局;但是,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仍会反复出现,局部冲突还可能发生,全面内战则可能避免。

十月事变的叶利钦政权,面临着的是五对国内矛盾(关系),政局稳定与否将决定于这些互相交织着的矛盾的发展。

第一,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机关的关系。十月事变前的两权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事变结束了这一局面,总统的权力得到加强。但是,西方的制约,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俄罗斯近年来形成的政治气氛和局面,都使被许多人认为有专制、独裁倾向的叶利钦难以实行个人独裁,未来的新议会不可能同总统和政府势不两立,也不可能只是后者的驯服工具,不可能只是谄议性质的。另一方面,俄长期的历史传统,今日俄

国政治经济形势对于强人政治的要求,又使俄国短期内难以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体制。激烈反对派的活动,特别是非正常的政治斗争活动方式将受到抑制和打击,但议会反对派将继续存在;在总统、政府与议会关系发展较正常的条件下,也许会出现总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分歧和斗争。

由此看来,叶利钦可能实现半独裁统治,在内政和外交上将有很大的决定权。

第二,各个政治派别关系。俄目前尚未转入政党政治的轨道,仍处于各个政治派别的不断分化、改组、各个政党的进一步形成时期。政治派别的斗争是影响政局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形成强大的、较稳定的支持总统和政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是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而这将有个较长过程。叶为代表的右翼政治派别仍将是主流派,其主要对手可能是以中间派面目出现的反对派。后者仍具备足以同前者抗衡的实力。受到沉重打击的左翼仍存在开展各种形式活动的某些条件和群众基础,不可能销声匿迹;如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则可能重新活跃,显示其力量。

由此看来,右翼政治势力会在内政外交上掌握主要的决策权,但受到中间派的极大牵制,上述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所确定的外交基本方针和政策将不太可能作重大修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再度被推出。

第三,中央政权与军队的关系。十月事变使军队在国内政治和决定对外政策中地位提高了,份量加重了。军队是俄政局稳定的主要支柱,但其作用仍将主要表现在出现动乱和激烈冲突的条件下,在正常的政治斗争和一般决策中可能仍取“不介入”的态度。根据俄国的国情和目前局势,还看不出军事政变和军人专政的前景,除了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由此看来，在对外政策上取较强硬态度的军队在对外政策中会有不容低估的影响，但还不是枪杆子指挥制定对外政策。

第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影响俄政局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叶政权面临的难题，但目前还不是主要矛盾。从俄政局的发展趋势看，地方自主权（特别是经济上的）将强化，中央权力将弱化，这也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但这是有限度的。俄国的历史传统、地理条件、当前俄的国际环境，都要求当权者把维护俄联邦的统一作为不可动摇的目标。因此，十月事变之后，地方要求扩大自主权的呼声，某些共和国和州闹独立的不会消失，但俄联邦象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的景象不会重现。

由此看来，俄国不会由于地方分离浪潮而造成形势的失控，影响同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则有利于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交流。

第五，政局稳定与经济改革，经济形势发展的关系。通过正常的政治斗争求得政局的稳定比武力解决问题要难，而解决经济问题，摆脱经济危机则比解决政治问题、摆脱政治危机更难。叶利钦这一派权力地位的稳固，从根本上说，将有赖于旧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的瓦解，私有者队伍的扩大。这就要求通过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局的稳定又有赖于经济形势、经济生活的相对稳定，而俄摆脱经济危机，最少也需要三年五年时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改革搞得太快，破产、失业增长，难免造成经济生活的波动，引起社会动荡。急进的经济改革方针政策的推行，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作为保证，叶派目前尚未取得这种地位，因此，在坚持原来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同时，对经济改革方针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是必然的。

由此看来，俄当权者在短期仍将为经济问题和稳住自己权力地位的斗争所困扰，因而在同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上有求于人，政治上也强硬不起来，这将有利于它同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关系的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东北亚其他国家的政策将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从而不会改变这个地区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的趋势。

当然，俄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俄日关系中的领土问题，俄中关系中俄国与台湾关系、人权问题也不是一劳永逸解决了。俄罗斯对东北亚其他国家的政策还受到它同东北亚地区以外各国关系，如同独联体国家、同东欧、同西欧和美国等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

还必须看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在东北亚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影响这个地局的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状况的，除了俄国与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外，还有：一是东北亚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如中日、中朝、中韩、日韩、日朝、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等）；二是东北亚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各国的关系（如日美、中美、韩美等等）。上述这些关系（矛盾）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其中有不少矛盾是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的消极和障碍因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注释：

- ①俄《莫斯科新闻》1992年3月。
- ②1992年7月3日盖达尔在俄议会的讲话。
- ③俄《外交通报》1993年专刊。
- ④俄《独立报》1993年8月17日。
- ⑤《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
- ⑥科济列夫在俄最高苏维埃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93年1月27日。